

曾国藩传

朱东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K827.5
6

曾国藩传

朱东安

著

中文样本图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曾国藩传 / 朱东安著 .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23-7

I. 曾 … II. 朱 … III. 曾国藩—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979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1168 毫米 1/32 印张17.5 插页 2 字数 392 千字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10001—14000册 定价：24.6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深刻透辟地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深入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同时，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资料丰赡翔实，分析雄辩有力，观念新颖，视野开阔，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前　　言

曾国藩(1811—1872)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一百多年来，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派别，甚或同一派别的不同人物，都曾对他作出过不同的评价。

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①；他的门生故吏则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独尊程、朱的理学家和革命党人开始对曾国藩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批判。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厘聚敛”^②之风，“以夷狄攻中国”^③，“杀人割地”^④，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⑤；也有人斥他为“残杀同胞”的败类、“遗臭万年”的“汉奸”^⑥。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则采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传忠书局版，首卷，第5页。

②④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浙江印刷公司版，第四卷，第56、57页。

③ 同上，第一卷，第1页。

⑤ 同上，第四卷，第42页。

⑥ 《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卷，第82页。

取客观主义的态度，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然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①。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适应新的形势，曾国藩提出一整套解决国内外矛盾的方针、路线和办法，并取得一定成效，故受到一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竭诚拥护，为其继承下来，尊为圣典。但是，这条路线终究归于失败，事实证明它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因而受到另一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坚决反对，口诛笔伐，视若寇仇。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整个近代史上，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一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则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更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样，曾国藩就不能不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对他的评价也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作者曾天真地认为，这不过是前人的历史局限，岂料今人亦未脱此态，总想借曾国藩做大文章。史学难如其意，就利用小说的舆论功能，终至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读《曾国藩》、学曾国藩的热潮。谁能相信，这一度席卷中华大地的“曾国藩热”，与现实政治、海峡两岸都毫不相干？惟作者相信，历史乃严肃的科学，治学之道亦历有明训，初心依旧，志趣难移，只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自该书初版以来，有关曾国藩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作者对曾国藩乃至整个曾国藩军政集团亦有一些新的认识。惟限

① 萧一山：《曾国藩传》，1964年台北版，第2、3页。

于本书体例，难以对近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展开广泛探讨。故此次修改再版，仅作个别文字与段落上的增删调整，所添幕府一章，亦不过填补原书的空白。至于近年学术成果的吸收、本人研究心得的表达以及不同学术观点的切磋，只好借助于专题论文和新著。但凡舛误及不足之处，无论新版旧版、著作论文，皆欢迎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一 跻身六曹(嘉庆十六年至咸丰二年 1811—1852) ...	(1)
时代与故乡	(1)
家风与影响	(7)
读书与科第	(11)
治学与交往	(13)
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31)
革除弊政的尝试	(35)
二 创建湘军(咸丰三年至咸丰四年 1853—1854) ...	(49)
应命出山	(49)
办团练勇	(57)
改革军制	(73)
编练成军	(86)
三 坐困江西(咸丰四年至咸丰七年 1854—1857) ...	(94)
初战败绩	(94)

攻占武昌	(105)
湖口惨败	(110)
罗走塔灭	(116)
委军奔丧	(123)
四 決戰安庆(咸豐八年至咸豐十一年 1858—1861)	...	(130)
再次出山	(130)
援浙之行	(134)
進圍安庆	(140)
總督兩江	(145)
拒不北援	(156)
困守祁門	(161)
攻陷安庆	(168)
五 攻陷天京(同治元年至同治三年 1862—1864)	...	(182)
督办四省軍務與三路進兵之勢	(182)
進退之爭	(192)
孤城難下	(202)
獨占頭功	(212)
天京浩劫	(222)
大功不賞	(231)
裁湘留淮	(239)
六 剿捻失敗(同治四年至同治六年 1865—1867)	...	(251)
坐觀成敗	(251)
剿捻無功	(258)

被劾回任	(274)
七 悵郁而死(同治七年至同治十一年 1868—1872)…	(287)
中兴幻想的破灭	(287)
忍辱求和	(301)
千夫所指 悵郁而死	(312)
八 知人慎用 幕府称盛	(319)
幕府概论	(319)
幕府办事机构	(347)
幕僚与人才	(395)
九 承往古衰朽之续 开近代风气之先	(428)
从理学家到洋务派	(428)
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	(458)
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	(485)
附录一 曾国藩生平经历年表	(491)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540)
后 记	(546)

一 跻身六曹

(嘉庆十六年至咸丰二年 1811—1852)

时代与故乡

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其国体政体无异于前代，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上，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痕迹。

早在入关之前，满洲贵族就实行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入关之后，他们尤为重视拉拢汉族士人参加政权，在中央各部、院的官职设置上，使满汉缺额，即官员编制中满人与汉人的数量相当，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也采取满汉参用的做法，从而笼络了汉族地主，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然而，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吏常常存有戒心，设计防范，不使他们掌握实权，尤其是军权。

清朝政权的中枢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行政。内阁仅康熙一朝较有实权，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便失去实权，变成例行公事的机关。总揽一切大权的是军机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讨论，由皇帝作出决定，向全国发号施令，所以时人和后人皆称军机处为“政府”。

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等)中特简差派，并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分别，按固定顺序排列。皇帝还指定一名亲王或大学士为首席军机大臣，称为“领班”，又称“首枢”。首席军机大臣多为满人，仰仗皇帝的倚重，总揽大权，汉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提出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受重视。鸦片战争时期的军机大臣王鼎，就是为起用林则徐一事，在道光皇帝面前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一再苦争无效，愤而自杀的。六部的实权也多掌握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不过是随同画诺而已。掌握清朝地方大权的官员是总督和巡抚，而总督的权力尤重，各地绿营兵及其长官提督，即受总督管辖。为防止汉族官员掌握军权，总督多任命满人，汉员不多。对于身任疆寄的汉族地方督抚，清廷有时也放心不下，往往指使满员暗中监视，密报他们的动向。对于一些地位不高但颇有实权的员缺，也限制汉员插足。例如掌管户部三库锁钥的下级司员和地处北京后方的热河道道员，就只限任旗员，不用汉人。此外旗员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遇婚、丧、疾病皆可请假，假满复职。汉员遇父母丧葬，必须回籍守制三年；遇结婚或久病不愈也要开缺；服阙或假满之后，除内阁中书等少数员缺外，都须重新入班候补，不能径复旧职。至于科考、补缺、升迁的难易，满汉之间更是悬若天壤了。

清王朝创立初期，几代统治者都颇为善于治理国家，其文治武功并不稍逊于汉唐盛世。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的发展，乾隆之世达到鼎盛时期。乾隆后期各方面矛盾开始暴露，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朝政日趋紊乱。奸相和珅的用事更加加速了这一腐化过程。乾隆死后，嘉庆帝虽然处死和珅，惩办了一

批罪恶昭著的官吏，但无力扭转这一衰败趋势，贪风不止，腐败日甚，直至道光末年无稍改变。与政治上日趋腐败的同时，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渐形恶化。乾隆中期以前，清朝财政每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及至嘉庆末年，国库已日呈入不敷出之势。清朝开创之时，主要依靠八旗，绿营仅起辅助作用；俟平定三藩时，八旗业已腐败，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取战胜，全仗绿营苦战之力。乾隆后期，绿营又重蹈八旗复辙，嘉庆初年镇压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主要靠各地团练武装追堵拼杀，绿营不过效八旗故伎，冒功而已。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乾隆中叶以后，长期潜伏民间的各种反清团体，诸如白莲教、天地会等及其名类繁多的支派逐渐活跃起来，零星的个别反抗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在山东首举义旗，接着发生了甘肃回民新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此伏彼起，旋兴旋灭，但却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引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首先在湖北荆襄地区爆发，很快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清政府征调半天下，耗银二亿两，花了九年的时间才把它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契机。从此，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此伏彼起，殆无宁岁。

正当这个老大帝国腐败日甚、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的时候，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乘机打了进来。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清朝军队，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法、美等殖民主义者接踵而至，纷纷效尤，遂将中华民族推入半殖

民地的苦难深渊。鸦片战争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之下，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起义和反抗更加频繁，尤其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两广和湖南，道光二十至三十年（1840—1850）间，这里几乎年年有起义发生，其中最著名者是道光二十七年的湖南雷再浩起义和两年后再度发动的雷再浩旧部李沅发起义。此伏彼起的群众反抗斗争的涓涓小溪，终于汇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咸丰元年发生在广西金田村的拜上帝会群众的武装起义，把农民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全国掀起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

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清代的道光年间，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①。曾国藩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②。所以，“道、咸前湘土殊少知名”^③。

同时，湖南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也较为尖锐复杂。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多种民族杂处，分别与川、黔、两广接壤，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变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使清政府调兵转饷倾动七省，成为持续九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前奏。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频繁。道光十二年瑶族赵金龙起义，四年后又发生蓝正樽起义，而小规模的反抗和冲突则几乎年年不断，无地不有。这种频繁的动

① 王闿运：《湘军志》，光绪十一年版，第一卷，第1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第58页。

③ 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1949年版，第二辑，第405页。

乱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湖南地主阶级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这点上，他们与安逸舒适的江浙地主有着明显不同。

另外，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

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理学兴于北宋而成于南宋，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因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出于二程门下（二程又师承于周敦颐），所以理学以朱熹为正宗，称为程朱理学，又称宋学、道学或洛（二程）闽（朱熹）之学、关（张载）濂（周敦颐）洛（程颐）之学。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周敦颐籍隶湖南道州，“濂溪”先生的称号就源于他家乡的一条河流。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其后，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都对湖南士人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①。所以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论其功

①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光绪九年版，首卷，第5页。

力则当首推魏源。魏源长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为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对湖南的学术风气有着很大影响。他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①。其馀学者如王文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都是讲求程朱理学的，同时也都很注重经世致用。而籍隶安化的陶澍，更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代宗师。他曾长期担任苏抚江督，在水利、财政、漕务、盐务等方面办理卓有成效，为后世所师法。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个名气最大的书院，“皆肇自宋代”^②，一个是前面提过的岳麓书院，另一个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上成为培育曾国藩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集团的首领和骨干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都在这里学习过，非就学于岳麓，即肄业于城南，道光年间的山长欧阳厚钧、贺熙龄等人，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也有人说：“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则林文忠、蒋砾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③至于曾国藩本人之

①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00页。

② 吴博夫《湖南民性》，第12页。

③ 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所以成为这个集团的首领，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

家风与影响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①，于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这个村子坐落在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嵋山下，离湘乡县城一百二十里（今属双峰县）。白杨坪一带是丘陵山区，山青水绿，林茂竹长，风景十分秀丽，只是消息闭塞，文化相当落后。曾国藩在一首诗中说，“恨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②。就是追述他幼时生活的环境。

曾氏祖籍衡阳^③，清初迁于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1808）他的祖父又把家迁到白杨坪。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曾麟书兄弟三人，排行居长，老二早殇，老三曾骥云无男，以兄子曾国华为继子。曾国藩一姊、三妹、四弟，共兄弟姊妹九人。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曾国藩最小的妹妹早夭，

① 曾国藩乳名宽一，道光十年去衡阳读书时取名子城，字居武。第二年又改号涤生。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后始改名国藩。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诗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诗集》），第三卷，第7页。

③ 曾国藩《衡阳曾氏谱序》（《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称，其远祖为曾参十五世孙，西汉末年以关内侯南迁避王莽之乱，成为南方诸曾之祖，先居江西一带，后分出一支迁往湖南衡阳，遂成为湖南曾氏的祖先。